



陈立胜 著

人圣之机

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人圣之机

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

陈立胜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 / 陈立胜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

(文史新论)

ISBN 978-7-108-06377-9

I. ①入… II. ①陈… III. ①王守仁 (1472-1528)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6278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校对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6.25

字 数 329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阳明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并呈现出跌宕起伏之态势。近代以降，阳明学中的心性话语成为民族国家建构、革命运动开展、政党政治运行的一个重要精神资源，阳明学的命运也由此更是潮落潮涨，极尽功罪褒贬之曲折。

本书旨在跳出惟“成功”是瞻的现代价值视域，以“龙场悟道”“知行合一”“心外无物”“致良知”等阳明学著名论题为焦点，追本溯源，疑义与析，从修身工夫的向度体会阳明学的义理内涵，领略致良知教的本地风光，管窥阳明学精神的本来面目，重返“为己之学”这一传统儒学的生命世界。

陈立胜，山东莱阳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儒家修身学、宋明理学、宗教现象学。著有：《自我与世界：以问题为中心的现象学运动研究》《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一体的立场看》《身体与诠释：宋明理学论集》等。

封面用图为王阳明唯一传世的山水画作《嘉林甘泉图》（轴/纸本/水墨 83cmx24cm），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本书是我多年来研读、讲授王阳明《传习录》的心得，今得以结集出版。感谢所有参加过这门课程的历届学生，他们的积极参与让我充分体验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精神快乐，又让我对教学相长这一古训有了更真切的理解。我要特别感谢赖区平博士，他几乎是本书各章最早的读者，其认真而坦率的评论，让我不断澄清自己的思路。

我还要感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孙海燕副研究员，他仔细校阅了全书，订正了多处文字错谬。

本书部分章节发表于复旦大学“回顾与展望：东亚儒学视域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届四明国际心学论坛、“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哲学的当代论争：以气论与身体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绍兴“纪念王阳明逝世 485 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终极关怀：宗教与哲学 2011 年青岛论坛”，感谢与会诸位先进的批评与意见。部分章节已正式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道德与文明》《贵阳学院学报》《中原文化研究》《阳明学研究》《宗教与哲学》，感谢上述杂志、辑刊编辑的校订工作。

我尤其要感谢我日渐老去的父母以及长期陪伴父母身边的妹妹与弟弟。

毫无疑问，以上感谢的所有人对本书可能包含的错误不负任何责任。

目 录

鸣 谢 · 1

导 论 阳明学登场的几个历史时刻：
当“王阳明”遭遇“现代性” · 1

第1章 语录体与理学家 · 44

第2章 龙场悟道论 · 74

第3章 知行合一论 · 114

第4章 “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一个“入圣之机”命题 · 133

第5章 “心外无事”：作为生活态度的格物论 · 146

第6章 “心外无物”论：“岩中花树”章新解 · 179

第7章 良知论（Ⅰ）：作为“知情意”三位一体的良知 · 203

第8章 良知论（Ⅱ）：作为“虚寂之体”的良知 · 247

第9章 良知论（Ⅲ）：作为“造化的精灵”的良知 · 280

第10章 “致良知”工夫论 · 302

第 11 章 如何守护良知? · 333

第 12 章 王阳明工夫论的路径与特色 · 363

第 13 章 王阳明三教之判中的五个向度 · 383

阳明学登场的几个历史时刻

当“王阳明”遭遇“现代性”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一种思想的“物质力量”总是在历史转折的时刻最能得到释放。实际上，在各种历史走势较力的空间之中，思想的较量本身就构成了历史转折的一部分。阳明学自其诞生之时起，就与历史时代脉搏之跳动一道呈现出跌宕起伏之态势。它在正、嘉年间横空出世，几十年间便传遍大江南北而盛极一时，然及至明清更迭，其命运却急转直下，一度成为神州陆沉的替罪羊，“王学”成了空疏、无用、误国的代名词，此后凋落消沉，蛰伏二百余年，终于又在晚清的“盛世危机”中冒地而出，王学“决然可以救国”“断然可以强国”竟然成了从维新、革命直到抗战三大历史阶段不变的主题。而在1949年前后，阳明学的命运又一次随着政权易帜转入谷底，只是这一次它从空疏、无用、误国变成了反动、落后与唯心。大国崛起，让阳明学的命运之轮再次转动，“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成了阳明学闪亮登场的最炫丽的背景舞台。检视这些阳明学的沉浮的历史时刻，反思阳明学这种过山车式的命运轮回现象，对于我们认识阳明学的时代性与永恒性、地域性与普遍性之关系自不无裨益。

一 明清之际

明清之际，阳明学在“尊朱辟王”的朱子学、顾炎武经世之学、尚习行重实用的颜李学派三股力量的不断围剿下，渐渐被世人视为“空疏”“清谈”“恣肆”“误国”之学。

张履祥（1611~1674）、吕留良（1629~1683）与陆陇其（1630~1692）声气相通，同斥王学祸乱天下之罪，张履祥说：“近世学者（指阳明学——引者），祖尚其说（指象山学——引者），以为捷径，稍及格物穷理，则谓之支离烦碎。夫恶支离则好直捷，厌烦碎则乐径省，是以礼教陵夷，邪淫日炽，而天下之祸不可胜言。”^{〔1〕}吕留良同样指出，陆王学不事“格物穷理”，而只盲从于内在良知，必造成“功利”“权诈”等谬害，而最终导致“陆沉”之家国之痛：“如陆、王之自以为立大体、致良知矣，而所为、所海，皆猖狂傲悍，日骛于功利、权诈是也。凡诸谬害，皆从不穷理而空致知来。”^{〔2〕}“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而紫阳之学，自吴（澄）、许（衡）以下已失其传，不足为法。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3〕}陆陇其则有明代亡于学术之判语：“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4〕}明代亡于王

〔1〕 张履祥：《与何商隐一》，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卷五，中华书局，2002年，第111页。

〔2〕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4—375页。

〔3〕 吕留良：《复高汇旂书》，《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11册，第71页。

〔4〕 有人曰：明亡乃气运使然，非关阳明思想事，倘明之衰可以怪阳明，那么宋之衰则可以怪程朱、周之衰可以怪孔孟乎？对此质疑，陆陇其反驳说：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矣，而阳明之道盛行天下，从民间到朝廷无不浸润于其教，“议论风气”“政事风俗”为之一变，致使“名教弛”“政刑轻”，最后酿成“丧乱”。见陆陇其：《学术辨》，《三鱼堂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325册，第15—18页。

学的观点几乎成了朱子学反击王学的一大利器，如张烈（1622~1685）《王学质疑》云：“阳明一出而尽变天下之学术，尽坏天下之人心，卒以酿乱亡之祸。”

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条：“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在“王介甫之新说”下，顾炎武又注曰：“《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衍）、何（晏）清谈之罪甚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其责。”^{〔1〕}顾炎武把三王（王衍、王安石、王阳明）并提，意在指责王阳明良知学误国，要王阳明对明王朝的灭亡负责。王、何开魏晋玄风而致“五胡乱华”，王安石《三经新义》“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而致靖康祸乱，至于王阳明的良知学之流祸较之前二者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新学之兴，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2〕}。

颜元（1635~1704）则程朱陆王并斥，称“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也”。因生活在清初，他对明亡一事自不宜过于渲染，于是只能围绕宋丧于异族之手做文章，一再称理学家要为宋亡负主要责任，对于理学读书、静坐之习，颜元论曰：“当时所急，孰有过于兵机者乎！正宜诱掖及门，成就数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迟者相与共事，则楚囚对泣之态可免矣。”^{〔3〕}对于朱子佛老之失说，颜元嘲讽说：“尽空一切者，却不

〔1〕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岳麓书社，1994年，第667页。

〔2〕 《日知录集释》卷十八，第662页；卷七，第240页。

〔3〕 颜元：《存学编》卷一、卷三，王星贤等点校：《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51、75页。

曾尽空，以吾中夏圣人之遗泽自在人心，自在遗俗，非佛氏不近人情、全无天理之道所能空也。惟先生辈以佛氏之实，灭圣人之业，而我中夏之学术尽亡，无由成人才，而一切乃真空矣。呜呼！岂惟吾道哉？虽求老氏之机关巧便，兵、数、刑名，何可得哉？故曰，宋儒为金、辽、元、夏之功臣。”⁽¹⁾言外之意，阳明亦是满清入关之功臣，“冒入孔庙从祀者焉能辞其责哉”？

持王学亡国论者绝不止以上数家，如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亦有以下激烈之判语：“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皆惟急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肤发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蒙古兴，其流祸一也。”⁽²⁾

明朝是否亡于学术、亡于阳明学，此处不论。⁽³⁾但将阳明学斥为空疏、无用、清谈、误国之学，一个很大的麻烦是阳明本人之事功在理学家乃至儒者之中都是佼佼者。于是何栋如（1572～1637）就说阳明会打仗跟他早年学习兵法有关，跟他良知学没有任何关系，跟他学习的徐波石（？～1552）任云南布政司期间中土司诈降之计而被杀，即说明阳明良知学之无用。⁽⁴⁾颜元则说，阳明只是天资高，会打仗而

（1） 颜元：《〈朱子语类〉评》，《颜元集》，第281—282页。

（2）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九，《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371页。

（3） 萧公权认为明代政治有四弊端，一曰吏事之弊，二曰兵制之弊，三曰开矿之弊，四曰田赋之弊。要之：“政乱于上，民困于下。寇流于内，虏迫于外。迅速灭亡，诚势所必至矣。”萧氏又说，明政之弊虽有多端，但病源在君主专制之一事。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6—548页。

（4） “何栋如曰：王伯安自十五六时即留心兵法。十九欲上书讨流贼，龙山公斥为狂，乃止。登第后，每宴会，辄聚果核作阵图行酒，营威宁伯葬地，即以束伍法督役，更番从事。龙场三载，动忍增益而良知悟矣。亡何开府南赣，出袖中兵符，举而措之，战不留行，虚实缓急之间有妙用焉，……乃世儒不察，猥云良知作用，韬铃若素闲。彼徐布政槌非伯安高弟乎？何一试于滇而身死贼手，为天下笑也？”谈迁：《国榷》卷五十二，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3244—3245页。

已，他本人则从不教学生习战，所以阳明在江西之事功，参与者皆外人，弟子辈都是旁观者。^{〔1〕}

二 清末民初

清初，王学流风余韵仍在，沈求如（1575～1656）、孙夏峰（1585～1675）、王朝式（1602～1640）、毛奇龄（1623～1716）、李二曲（1627～1705）、汤潜庵（1627～1687）、万斯大（1633～1683）、万斯同（1638～1702）、彭定求（1645～1719）、邵念鲁（1648～1711）等皆有强烈的王学情怀。面对天下士子之极诋阳明，彭定求挺身而出，著《阳明释毁录》一一驳正，对于明之不亡于朋党，不亡于寇盗，而亡于学术之归狱，彭定求驳曰：“嗟夫！诚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说互相警觉，互相提撕，则必不敢招权纳贿，则必不敢妨贤虐忠，必不敢纵盗戕民，识者方恨阳明之道不行，不图诬之者颠倒黑白，至于斯极也。”^{〔2〕}然康、雍年间，王学已成众矢之的，其势渐衰，逮至李穆堂（1673～1750）王学几成绝响。乾、嘉而后，汉学一支独大，程朱理学亦不绝于缕。

道、咸以来，徐润第（1760～1827）、夏炯（1795～1846）、鲁一同（1804～1865）、曾国藩（1811～1872）、李元度（1821～1887）等复又陆续称颂阳明事功与修身工夫，阳明兼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1〕 面对阳明破贼建功、体用兼全之说，颜元反驳说，阳明“但是天资高，随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专以是学，专以是教，专以是治也”。阳明精通韬略，何以断定其不以学教者？颜元答曰：“孔子尝言：‘二三子有志于礼者，其于赤乎学之。’如某可治赋，某可为宰，某达某艺，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王门无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冈，所共事者皆当时官吏、偏将、参谋，弟子皆不与焉，其《全书》所载皆其门人旁观赞服之笔，则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学教也。”颜元：《存学编》卷一，《颜元集》，第45页。

〔2〕 凌扬藻撰：《蠡勺编》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467页。

说法亦开始出现。^{〔1〕}

然而，清末的“盛世危机”才是阳明学真正的“空前转机”。

王阳明成为近代士大夫关注之焦点，肯定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刺激有关。明治维新、甲午海战、日俄之战与留日潮这一连串相关联的事件，成了阳明学登场亮相的舞台背景。

1906年出版的警世小说《伤心人语》（振聩书社）之《东京支那学生之现象记》收有《王阳明生于日本之笑谈》一文：

日本维新诸豪，如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无不得力于王阳明之学。近世日俄战争对马海岛一役，东乡平八郎以相等之军舰力，四十余时间，歼俄舰全军，使之只轮不返。观其料敌之精密，执事之静逸，从容布置，不为物动，故能奏此黄白相战之第一功。然闻其语人，谓平生得力在阳明知行合一之旨，是处以危难而不惊。自此，日人之视阳明愈益加重。故近日彼中人士，每与吾国人言则必谈及王阳明之学。有某省师范生，平日于阳明尚未寓目，即阳明出处亦觉茫然不解，某日与日人谈，日人谓阳明先生之学吾国人皆以此为宗，支那学生更宜研究等语。某师范生用笔谈答曰：“贵国能生一个阳明，所以能打破俄国。若敝国也能生一个阳明先生，那就好了。”

这段话颇能折射出阳明学近代复兴的背景，日本维新的成功——这与甲午一战中国的完败联系在一起，日俄战争（黄种人在与白种人战争之中首次取胜的战争）——这与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联系在一起，言必谈阳明的日本——这与不知阳明为何国人的中国联系在一起，一言以蔽之，阳明学即在这种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大清的衰落之强烈反差的

〔1〕 参张昭军：《清代理学史》（下），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7—279页。

意识之中登场了。而文中所提及的“奏此黄白相战之第一功”者东乡平八郎(1848~1934),其克敌制胜的“葵花宝典”依然是王学。“一生低首拜阳明”在随后的中国报刊之中屡屡曝光,最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第3卷第6期的《海事》杂志刊出的《海军中之王阳明崇拜者》一文,称“阳明之学,盛行日本。其海陆军人之奉之者,如以击破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著称之东乡平八郎,其少时尝镌一印章,悬于襟带,文曰:‘一生低首拜阳明。’及其破波罗的海舰队,获胜而凯旋也,迎之者欢呼夹道,东乡又吟曰:‘愧对故乡诸父老,凯歌能得几人还。’雍容儒雅,深得古人功而不伐之意。夫阳明,我国之学者也,而我国海陆军人奉之特少者,何也?”以阳明学武装军队的想法跃然纸上。⁽¹⁾

确实,清末维新派是阳明学的吹鼓手。早在戊戌变法之前(1893年),康有为就认定“言心学者必能任事,阳明辈是也。大儒能用兵者,惟阳明一人而已”⁽²⁾。在戊戌变法后康有为对王学更是日趋好感,认为王学“直捷明诚,活泼有用”,乃至给门人梁启超留下“独好陆王”之印象。⁽³⁾1899年梁启超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之中指出,孔教本是“强立主义”而非“文弱主义”,然晋唐以后,儒者懦弱无气,惟明代王学,“稍复本真耳”,而考据学兴,“柔弱益甚,遂至圣教

(1) 早在清末(1906年)就有教育官员认识到东乡平八郎与阳明学的关系,贵州学政朱福诜(1841~1919)即上书光绪帝称日本明治维新之时,醉心欧化之士多为法兰西之自由学派,士风遂有陷入无政府主义之虞,有识之士遂以国家学说提倡,而一变为德意志之国家学派。故中国应将忠君、尊孔作为学堂宗旨,“俾诸学生有以植根本而端志趋”,接着朱福诜就指出:“日本之伊藤博文、东乡平八郎皆为王守仁之学者,将相之业盖有由来,天下未有无本之学,亦未有无体之用,未可目为迂阔也。”见《四川官报》,第20册。

(2) 《南海师承记》卷二,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23页。

(3) 吴义雄:《理学与戊戌前后康有为的思想体系》,王晓秋主编:《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39页。康有为接触与了解明治维新的具体过程见朱忆天:《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67页。

扫地，国随而亡”。⁽¹⁾可以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为有道学情结的士大夫从汉学传统的重压下翻身做主看到了希望。在《清朝续文献通考》中，刘锦藻（1862~1934）就指出：“阳明一代大儒，即知即行，于东西哲学不谋而足相印证。日本明治维新大半原本王学姚江学派，诂之于国中，而衍之于海外，以是知天下无无用之道学也。”梁启超在1903年撰文《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称：“吾国之王学，维心派也。苟学此而有得者，则其人必发强刚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观明末儒者之风节可见也。本朝二百余年，斯学销沉，而其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是心学之为用也。”⁽²⁾在著名的《新民说》中任公以其特有的夸张笔法称：“晚明士气，冠绝千古者，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功不在禹下”本是韩愈论孟之语，任公用之于王学，又谓王学“任事”“有用”，这与明末清初王学“空疏”“无用”之论可谓有霄壤之别。维新派的这些声音均可以视为新世纪道学救国论、王学救国论的先声。

不只维新派向王学致意，就连被称为保守的清宗室大臣也加入了王学的欢乐颂的队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初一，荣庆（1859~1917）上书奏请定学堂宗旨，⁽³⁾其要是学堂应借鉴东西各国经验，以“涤除陋习，造就全国之民”之“国民教育”为宗旨，而国民教育则必须结合现实国情扬长补短。扬长即发挥“中国政教之所固有”的“忠君”与“尊孔”的传统，补短即就“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尚公”“尚武”“尚实”）加以推广。“扬长”重在“扬”字。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但都以崇敬国主为“政治之本”，近世崛起之国（德国与日本）之教育或重在“保帝国之统

（1）《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65页。

（2）《饮冰室文集之九》，《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46页。

（3）事见谢兴尧整理点校：《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7页。

一”，或重在表章“万世一系之皇统”，所以新时代忠君教育必须与爱国教育结合在一起，旨在培育国民“君民一体”的意识，而东西各国教育又“必于其本国言语文字、历史风俗、宗教而尊重之，保全之，故其学堂皆有礼敬国教之室”，故新时代尊孔教育则必须确立孔教为国教之地位：“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但面对列强“雄视”与“竞起”之局势，“国民”教育又必须立足于“图存”，“补”传统之“短”，“尚公”“尚武”“尚实”以克服“中国之大病”（“私”“弱”“虚”）：“尚公”即提倡“公德”，“务使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如家”；“尚武”即要“全国皆兵”，老幼男女“无不以充兵为乐”，“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国文、历史、地理、音乐、体操诸学科均应培养学生“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与守纪律、守秩序之品德；“尚实”即要学习泰西科学，“以求实业为要政”。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大宗旨下，王阳明作为“实用”的典范登场了：“夫学所以可贵者，惟其能见诸实用也。历代理学名人，如宋之胡瑗，明之王守仁，国朝之汤斌、曾国藩等，能本诸躬行实践发为事功，足为后生则效。至若高谈性命，崇尚虚无，实于国计民生曾无毫末裨益；等而下之，章句之儒，泥于记诵考据之末，习非所用，更无实际之可言。”^①

面对积弱积贫、奄奄一息的清帝国，“军国民主义”成了保守派、维新派、革命派的共同诉求，而此诉求同样是由东邻催发的。秋瑾在1904年发表的《警告我同胞》一文，详细生动地描述了她在横滨见到日本男女老少欢送赴俄打仗的士兵的场面：“在路上听进好热闹的军乐，

① 冯克诚主编：《清代后期教育思想与论著选读》（中），人民武警出版社，2011年，第268页。

又看见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手执小国旗，像发狂的一样，喊万岁，几千声，几万声，合成一声，嘈嘈杂杂，烟雾冲天……那军人因为送他的人太多，却高站在长凳上，辞谢众人。送的人团围绕住，一层层的围了一个大圈子。一片人声、爆竹声夹杂，也辨别不清。只见许多人手执小国旗，手舞足蹈，几多的高兴。”秋瑾看到这个场面，大发感慨：“真正令人羡慕死了。不晓得我中国何日才有这一天呢？”她接着悲叹说：“唉！列位，你看日本的人，这样齐心，把军人看得如此贵重，怎么叫他不舍死忘生去打仗呢？所以都怀了一个不怕死的心，以为我们如果不能得胜，回国就无脸去见众人。人人都存了这个念头，所以回回打仗都是拼命攻打，不避炮火。前头的死了，后头的又上去……”⁽¹⁾实际上，这是同时期留日学生的共同印象，如陈天华所记：“余每见日本人之欢迎其海陆军帅也，殆举国如狂。”⁽²⁾梁启超在目睹了日本人送别出征军人的情景后，写下了《祈战死》（1904）一文，表达了他对日人“祈战死”“勿生还”、举国上下的“好武雄风”的崇敬之情。⁽³⁾日本人的这种武士道精神、尚武精神深深刺激了梁启超，他对德、日军国民主义文化推崇备至，认为分国散立、萎靡不振的日耳曼民族之所以能“摧奥扑法”，迅速崛起，端在于“首创举国皆兵之法”，举国之人均受军人教育，均备军人资格。而日本之所以能“一战胜我，取威定霸”，屹立于东方，端因其民“剽疾轻死”，人人具军人精神，人人有军人本领，武士道、大和魂大昌其风。而日本人“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之论调，更是让梁启超愤愤不平（“耻其言”“愤其言”），特撰《中国武士道》一书。在成书于同年的《新民说》中，梁氏更专辟“论尚武”一节，以中国民族不武为奇耻大辱：“中国民族之不

(1) 《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7—8页。

(2) 陈天华：《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78页。

(3) 《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56—357页。